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 传承弘扬革命文化

李志东



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有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做好革命文物工作是其中蕴含的重要内容，要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做好革命文物工作，有利于见证伟大奋斗历程、赓续红色血脉，进一步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 充分认识十八大以来革命文物保护的历史性变化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并赴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启航时刻，从此次活动中，可以体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意。

据国家文物局数据，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100万件/套。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旧址开放率接近94%，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超过1600家，“十三五”时期平均每年推出革命文物展览4000余个。进入十四五时期，国家对革命文物更加重视，国家文物局制订发布《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各地制定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实施方案，全面确立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

任务书和路线图。革命文物机构队伍建设取得重大突破，24个省级、20多个市级文物主管部门设立革命文物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全面确立了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任务书和路线图。革命文物工作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日益确立，形成革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相关制度规定先后颁布实施，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对保护革命文物进行规范引导。与此同时，各地区各部门通过法律等手段，对损毁革命文物、诋毁英烈以及英烈纪念设施保护不力等行为坚决说“不”，并向全社会公布这些典型案例，对于保护英烈和革命文物、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匡正社会公序良俗，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意义。

坚持科学保护、注重传承 切实提升革命文物系统化保护水平

统筹推进革命文物资源普查与研究、申报、认定，进一步摸清革命文物资源家底及保存现状。目前，一些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中的革命文物和革命陈列还存在内容相近、展品较少，文化内涵挖掘不足、观众参与性、体验性不佳，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就需要不断充实革命文物数量，加强革命史实研究和革命文物价值挖掘，让文物相互关联、相互映衬，串联起革命战争年代感人的红色故事，以满足人们对革命文物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价值全面了解的需求。承载着鲜活、有血有肉革命故事的文物呈现在观众面前时，能增强革命文物的感召力，真正从心灵上触动、情感上打动人、思想上教育人。各地革命文物单位应广泛挖掘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各界人士，如收藏家协会、民间收藏人士等力量，积极寻找革命文物线索，开展文物征集，不断丰富充实革命文物。

注重传承转化，充分彰显革命文物的新时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文旅融合 深化拓展革命文物宣教功能

文旅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文化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诗和远方，已成为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必需品之一，红色文化的弘扬，红色旅游的推广，也倒逼博物馆、纪念馆更好地保护利用革命文物。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推进红色旅游中，让游客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在让游客满足感、获得感得到提升的同时，也使其了解了革命历史，增长了革命知识，学习了革命精神，真正达到文旅融合。不断通过精品展览，开发利用好革命文物，使之成为开展国防教育和党史学习的“活教材”。深入挖掘红色精神财富，善于借助“互联网+”，引入VR、全息投影等新技术，直观生动地呈现历史事件和场景，使游客通过沉浸式体验获得内心的震撼，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用心用力发挥好红色资源的正向引领作用，加强红色资源对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对理想的淬炼，不断为人民群众“加油充电”。始终保持信仰不变、信念不移，用红色

精神补钙壮骨、固本培元，以昂扬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博物馆、纪念馆是保护革命文物、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不仅承担着对馆藏革命文物保护、修复的重要职责，也承载着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伟大使命，必须以踔厉奋发的精神状态，提炼展示革命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把革命文物保护好、利用好，把红色故事发掘好、讲述好，我们就能从中不断汲取奋进的力量。从革命历史中补充红色基因，激发奋勇前行的信仰伟力，凝聚起上下同心的磅礴力量，就能更好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供销社”

——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公卖处

李归宁



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公卖处



公卖处的货柜和中药柜

10月中旬，一则关于“湖北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成果”报道引发舆论的关注。报道称“湖北省实施‘基层社恢复重建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一时间，关于“供销社重出江湖”“重启供销社”的声音此起彼伏。供销社一词，对于40后到70后的这批人来说，是不陌生的，甚至可以说是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什么是供销社？在中发11号[2015]文件指出：“基层社是供销合作社在县以下直接面向农民的综合经营服务组织，是供销合作社服务‘三农’的主要载体，要按照强化合作、农民参与、为农服务的原则，因地制宜推进基层社改造，逐步办成规范的、以农民社员为主体的合作社，实现农民得实惠、基层社得发展的双赢。”如果以此为依据，追溯我们党的经济建设历史，其实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已经成立了具备“供销社”特征和职能的公有制经营组织——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公卖处。

井冈山斗争时期，战斗非常频繁，敌人在对我们进行军事进剿的同时，实行了极其严密的经济封锁。军民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道：“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红军士兵群众生活的不安，有时真的是到了极度。”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如何在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同时，解决军民的生产生活之需，成为边界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是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储备充足的粮食”是巩固军事根据地的重要方法；“保护小农人做买卖”是活跃贸易往来的政策。为了实现根据地内的供给，边界党带领当地群众采取了许多措施，积极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和军需品的生产，比如创办红军造币厂、被服厂、军械处、硝盐坊、粮库、药材库等，组织大家生产粮食、蔬菜，自己做军服、鞋帽，维修枪械；建立草鞋坊、大陇坊、公卖处等，通过各种渠道把白区的物资秘密输送到根据地，解决军民生活所需。

1928年夏，新(永新)遂(遂川)边陲特别

区工农兵政府决定在所辖的10个乡分别设立一个公卖处，在茨坪店上村设立了最早的特别区公卖处。老红军罗冬祥曾回忆说：“当时井冈山共有5个公卖处，属新遂边陲特别区政府直接管的是茨坪和小井两个公卖处，茨坪公卖处的负责人是王佐派来的宁冈楠木坪一姓王的小井公卖处的负责人叫申丁贵，大井乡公卖处是由柳辛林、王培荣负责，下庄乡公卖处是陈以梓负责，白银湖乡公卖处是陈开子负责。”公卖处的货源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红军打土豪时获得的部分战利品，如银制品、粮食、肉禽等；二是从白区偷运上山的生活物资，如食盐、布匹、药品等；三是红区内集零为整的收购物品。这些商品被集中在公卖处后，再以平价的方式出售给当地群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既方便了群众，又减少了中

间商的层层盘剥。当时的公卖处有两种形式：一是以政府经营的形式存在，比如设立在茨坪的特别区公卖处，它的货品大部分是由新遂边陲特别区政府用打土豪筹集的款子和战斗缴获的物资组成，为了加强对公卖处的领导，各级苏维埃政府派出干部专门到公卖处工作，并要求各乡公卖处要特别注意相互调剂货物，以保证商品的平衡供给。另一种是以集股的形式存在，比如大井、下庄、罗浮等地的公卖处，资金由群众自愿入股筹集，通过公卖处到白区、圩场或者群众中零星采购货物，回来后卖给边界军民，年终按股分红，这种公卖处则具有集体经济性质。但无论是哪种存在形式，不可否认的是，公卖处在当时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起到了稳定市场物价，促进物质交流，搞活红色区域经济，解决军民生产生活之需的重要作用。老红军罗秋开回忆说：“打下遂川、永新后，缴到大批的油、盐、布匹等放在防务委员会，由公卖处去领，再由公卖处出售，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有卖，主要供应五大嘴口的人。”

95年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外交困，外有军阀混战，内有“会剿”不断，“左倾”错误路线和经济封锁，红军被困于方寸之地，却能发展壮大，建立根据地，制定出一系列有地方特色，接地气可操作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在战火纷飞中设立公卖处这样的商业形式，无疑是我党经济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发展了边界的贸易往来，争取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天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供销社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中能更好地发挥合作经济的功能，助推乡村振兴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目标，达到为农服务，省去中间环节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保障人民生活物资需求。

从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公卖处到计划经济时期的供销社，再到现在的合作社，基层社一脉相承，无不体现了我们的党一直都在探寻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径。

一份珍贵的会议报告

卢润彩



《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



七届二中全会会场



七届二中全会旧址

西柏坡纪念馆收藏着一份《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该文件长30厘米，宽21厘米，纸张微微泛黄，包括封面在内共18页。封面中间位置竖排排列文件名“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标题上方写有“马上付印一份，发给各同志”，以及文件号“#40001”，标题右上角印着“（机密文件，不得遗失，阅后收回）”，旁边用红色墨水将“决”字改为了“秘”。标题左下角标注时间“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印”。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并且把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议题和任务进行了明晰的说明。

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出了《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名单，先行电告。”同时，中央对参加会议的人员和能否参加会议做了考虑和安排：“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因病如不便东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期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这份通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正文仅用短短的7句话，200多字，就把会议的时间、地点、会期，以及对部分同志能否到会都做了清晰安排。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

利开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3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习仲勋等19人；列席人员有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等11人。

全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在会上作了《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报告全文共8000余字，分为10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以及每种方式的优点和缺点。第二部分明确了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第三部分说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第四部分告诉广大同志城市斗争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第五部分指出党在南方和北方不同的工作任务。第六部分分析了中国的经济成分和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第七部分说明如何消除帝国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控制权。第八部分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九部分进一步说明如何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第十部分要求全党同志继续保持优良作风。

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定下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

取的基本政策，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他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郑重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从“两个务必”升华为“三个务必”，更加彰显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管党治党的高度警醒和战略自觉。

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指出“常委会的工作方法”的12条经验，号召干部学习12本必读书籍。为了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腐蚀，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六条没有写进决议的规定：“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迎接全国胜利的迅速到来，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